

# 诸葛亮与 三国文化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编著  
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

 文物出版社

# 诸葛亮与 三国文化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编著  
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诸葛亮与三国文化. 八 /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成都市  
诸葛亮研究会编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 - 7 - 5010 - 4848 - 9

I. ①诸… II. ①成… ②成… III. ①诸葛亮 (181 - 234) -  
人物研究 ②传统文化 - 研究 - 中国 - 三国时代 IV. ①K827 =  
362 ②K236.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0539 号

## 诸葛亮与三国文化 (八)

---

编 著: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

责任编辑: 孙漪娜

助理编辑: 王海东

封面设计: 孙 鹏

责任印制: 张道奇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mailto: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5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0 - 4848 - 9

定 价: 120.00 元

---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 《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八）》编委会

**单 位**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

**主 任** 谢 辉

**编 委** 阎瑞海 李加锋 方北辰 沈伯俊 谭良啸 李兆成  
吕一飞 何红英 卫永锋 丁 浩 周可华 李亚红  
罗新本 高大伦 段 渝 江章华 许蓉生 张渝新  
梅铮铮 张红灵 安剑华 符丽平

**主 编** 谢 辉

**副主编** 李加锋 何红英 卫永锋 梅铮铮

# 目录

## 历史探索

略论汉魏三国时期的“鼓吹”及鼓吹曲辞之演变 / 谢 辉 梅铮铮 / 003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解读刘备临终给儿子的遗嘱 / 张 祎 谭良啸 / 013

论南中地区叛乱对蜀汉南中官员配置的影响 / 安剑华 梅铮铮 / 021

“一箭之地”

——诸葛亮南征及其与藏、彝等族群的文明接触 / 曾穷石 / 035

论诸葛亮木牛流马 / 李遵刚 / 049

木匠论“木牛流马”的制作 / 司绍荣 / 064

“威震华夏”钩沉

——《资治通鉴》忽略的《三国志》并裴注史料 / 瞿正瀛 / 073

曹魏时期无极甄氏的发展轨迹 / 郭的非 王 音 / 090

初论三国时期赦宥制度 / 樊博琛 / 101

## 调查专题

诸葛亮“西和诸戎”的典范

——彭州白虎夷王城、白虎夷王墓考论 / 李加锋 黄 琦 / 119

弥牟三国八阵图遗址考论 / 陈 芳 申 雷 / 129

- 巴中地区的严颜崇拜初探 / 刘 斌 么锐卿 / 139  
成都地区三国文化旅游资源评价 / 申 雷 金正 / 143  
川北地区的三国文化资源旅游开发初探 / 苏 婷 李加锋 / 153

---

## 文化苑地

- 诸葛亮流风遗韵概说 / 方北辰 / 167  
《三国演义》与政治智慧 / 沈伯俊 / 183  
国土情怀与好汉气概  
——《三国演义》、《水浒传》比较研究之一 / 沈伯俊 / 193  
诸葛亮的规划才能与《隆中对》 / 吴 娟 谭良啸 / 202  
“伯仲之间见伊吕”  
——略论杜甫咏赞孔明诗的作用与影响 / 何红英 / 215  
诸葛亮执法四论 / 奚 奕 谭良啸 / 227

---

## 文博研究

- 武侯祠诸葛亮像小考 / 吴 娟 / 243  
成都武侯祠藏杜甫诗意画鉴赏 / 尹 恒 / 250  
清代道士与成都武侯祠 / 王晓乔 / 263  
武侯祠与刘备陵庙合而为一的解读 / 吴云霞 / 277  
遗址类博物馆举办民俗庙会的社会调查  
——以成都大庙会为例 / 李思檬 / 284  
2015 年全国三国文化研究成果综述 / 蒋 英 苏 婷 樊博琛 / 291  
  
后 记 / 303

历

史

探

索

道川  
文化

## 略论汉魏三国时期的“鼓吹”及鼓吹曲辞之演变

谢 辉 梅铮铮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鼓吹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含有宣扬、提倡、吹嘘的意思，既是褒义词，也可用于贬义。但它的起源是敲击、吹奏乐器的演奏组合。《辞源》释曰：“鼓吹，乐名。主要乐器有鼓钲箫笛，出自北方民族，本为军中之乐。”据此可知，所谓“鼓吹”，即源自北方民族的敲击、吹奏乐器。一般用鼓、钲和吹奏乐器如箫、笛组合在一起，在军队中共同演奏乐曲。然将敲击和吹奏器乐组合在一起演奏源于何时？何以出自北方民族？何以为军乐？却语焉不详。查阅史书，将“鼓吹”合在一起成为专用词汇起源于汉代。《汉书·叙传上》记载：“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班壹在秦末避乱于边远之地楼烦，到汉惠帝刘盈和高后掌权时，因大汉政权初定，朝廷未对周边民族制定各种禁忌。于是像班壹这样有一定势力的雄豪外出弋猎时，可以任意使用各类颜色的旌旗和鼓吹等打击吹奏乐来彰显声威。此后，班壹始创的鼓吹可能因其组合新颖，并包含北方边地民族的苍凉音韵而为汉人接纳，以至于成为汉魏三国时期的常用之乐。北宋时期郭茂倩《乐府诗集》卷第十六载：“鼓吹曲，一曰：短箫铙歌。”书中引刘琨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朔野而有之矣。鸣笛以和箫声，非八音也。”又引蔡邕《礼乐志》曰：“汉乐四品：……其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由上述历史文献可知，汉班壹是鼓吹首创者，其中一种鼓吹又名短箫铙歌，属于军乐。但这并不能解释鼓吹怎样成为军乐，它与人们熟知的军中配备的金鼓又有什么不同？

### 一、“鼓吹”与金鼓功能不同

据蔡邕《礼乐志》和现代《辞源》所释，鼓吹是军中之乐。前辈学者如孙机

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和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中，皆将其叙述为“军乐”。我们在查阅相关史书中发现，鼓吹虽云“军乐”，但与真正指挥军队作战、进退所用的金鼓用途是不同的，二者之间的使用有严格的区别。据《吴子·应变》记载：“凡战之法，昼以旌旗旛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从令者诛。”《尉缭子·勒卒令第十八》：“金鼓铃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左传》中的“曹刿论战”就是众人熟知的例子。又如《汉书·晁错传》载晁错上书孝文帝强调，与匈奴作战，如果平日战士不经过选拔和严格训练，那么一旦打起仗来，就会“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指相失”。颜师古注释道：“金，金钲也。鼓所以进众，金所以止众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记载曹操操练军队时，“王亲执金鼓以令进退”。《三国志·魏书·公孙渊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记载，孙权本想用金玉珍宝收买公孙渊，结果贪婪的公孙渊不仅杀了使者，还让部将韩起、柳远引诱孙权的部下贺达、虞咨前来交易，“起等金鼓始震，锋矢乱发，斩首三百余级，被创赴水没溺者可二百余人”。《三国志·蜀书·黄忠传》记载黄忠在定军山与夏侯渊交锋时，“忠推锋必进，劝率士卒，金鼓振天，欢声动谷，一战斩渊，渊军大败”。像这类鸣金鼓作战的例子很多，简言之，击鼓为攻击的信号，鸣金则为撤退的指令。上引书中所言的“金”不止钲一种金属乐器，至少有六种。《宋书·乐志》：“金，钟也，搏也，罇也，鐃也，铙也，铎也。”其中鐃即是钲，“形如小钟，军行鸣之，以为鼓节”。同书又载：“春秋时叙，雷霆震威耀，进退由钲鼓。”可见钲即金之一种，然在实际作战中并非六种乐器一起采用，应是根据战场需要选取一两种而已。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征战中所指金鼓不属于鼓吹。我们可从1949年出土东晋永和十三年（357年）冬寿墓室壁画中，清晰地看到鼓吹和金鼓的场面（图1）。该壁画位于墓后室的东面和延续向北面末端的回廊壁上，场面浩大，有250人。画中墓主人冬寿乘牛车手持麈尾居队列中央，除持戟拥盾、肩扛斧钺、弓箭的步兵外，还有身着甲冑、手持长兵的重铠骑兵。在肩扛幡旗的步兵前，有两面鼓、一个钲，鼓和钲上撑着四角伞，分别由两人抬着，一人援桴敲击，这就是共九人组成的指挥军队进退的步行金鼓队。在冬寿和骑马官吏左后还有四人组成的骑兵乐队，一人敲击竖有羽葆的建鼓，一人吹箫，一人吹笛（一说角），一人击铙，这就是“鼓吹”。这些乐器在队伍中不仅排列位置不同，种类、数量的组合也不一样，当然在行军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但是从文献中记载实例来看，在两汉到魏晋时期，同为“军乐”的鼓吹真正运用于军中征战厮杀的时候较之金鼓要少，更多是用于其他场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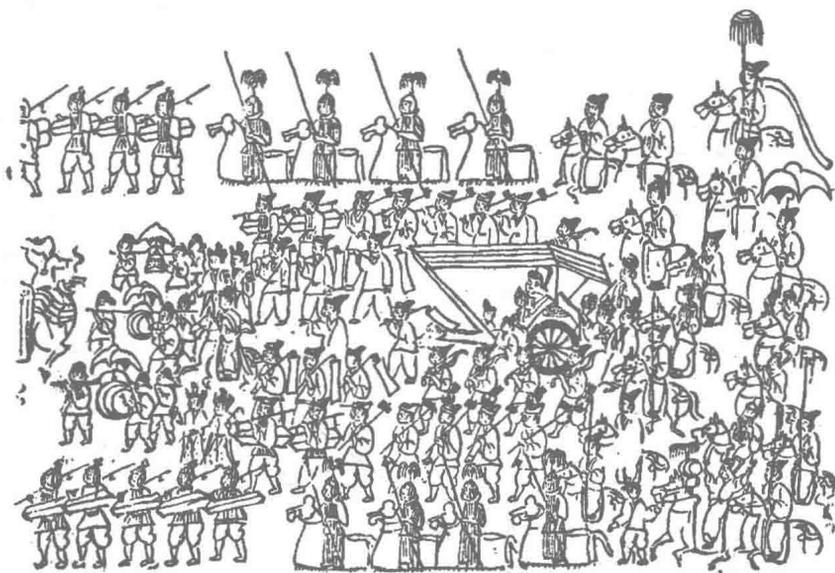


图1 冬寿墓室壁画线描图中金鼓（左）、鼓吹（右）的位置

## 二、“鼓吹”是汉魏三国时期丧葬祭祀之常用礼乐

鼓吹虽起源于北方，最初是班壹为“以财雄边”震慑边地民族，但其箫、笛吹奏出的音调悠远而苍凉，以至于汉王朝将其作为丧葬礼乐使用。《后汉书·礼仪志下·大丧条》李贤注引丁孚《汉仪》曰：“永平七年，阴太后崩，晏驾诏曰：‘柩将发于殿，群臣百官陪位，黄门鼓吹三通，鸣钟鼓，天子举哀。’”同书《耿秉传》载，耿秉死后，“赐以朱棺、玉衣，将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营骑士三百余人送葬”。同书《孙赐传》载，孙赐死后，汉灵帝素服，三日不临朝，“及葬，又使侍御史持节送丧，兰台令史十人发羽林骑轻车介士，前后部鼓吹，又敕骠骑将军官属司空法驾，送至旧茔”。《三国志·魏书·庞德传》裴松之注引王隐《蜀记》曰：“钟会平蜀，前后鼓吹，迎德尸丧还葬邺，冢中身首如生。”从汉过渡到魏晋时期，世人对于丧葬之事的认识有一个由极为重视到逐渐从简的过程。而鼓吹则是这一过渡期中经常使用的一种礼仪乐器，《晋书·礼志中》中记载：“汉魏故事，将葬，设吉凶卤簿，皆以鼓吹。”

## 三、“鼓吹”是东汉宫廷筵乐、迎宾之礼乐

到东汉时期鼓吹也是专用宫廷乐曲之一，其专用名称为“黄门鼓吹”。它的用

途不单是用于丧事，也用于宫廷仪仗、筵乐和迎宾，据蔡邕《礼乐志》曰：“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二曰《周颂雅乐》……三曰《黄门鼓吹》。”其中《大予乐》用于典庙、上陵、郊乐；《周颂雅乐》则用于典辟雍、乡射、六宗等社稷之乐；而《黄门鼓吹》，蔡邕举先秦《诗》中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为古代礼仪，指出此之谓“天子所以宴乐群臣”时所演奏的音乐。晋崔豹《古今注》言：“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也。”《后汉书·礼仪志上》李贤注引丁孚《汉仪》曰：“皇后出，乘鸾辂，青羽盖，驾驷马，龙旗九旒……置虎贲、羽林骑，戎头、黄门鼓吹。”《后汉书·夫余传》曰：“顺帝永和元年，其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后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曰：“汉立皇后，国礼之大，而志无其仪，良未可了……皇后伏，起拜，称臣妾。讫，黄门鼓吹三通。”黄门鼓吹在东汉也是职官名称之一，《后汉书·孝安帝纪》：“壬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宋书·礼志五》：“黄门鼓吹、及钉官仆射、黄门鼓吹史主事……给绛褙，武冠。”而作为皇家礼仪队伍的黄门鼓吹人数是没有具体规定的，一般说来人数都是比较庞大的。《后汉书·孝安帝纪》中李贤注引《汉官仪》曰：“黄门鼓吹百四十五人。”至于赏赐给臣下的鼓吹队人数要少得多，《后汉书·百官志一·将军条》李贤注引《梁冀别传》曰：“元嘉二年，又加冀礼仪……增掾属、舍人、令史、官骑、鼓吹各十人。”应劭《汉官仪》曰：“鼓吹二十人，非常员。舍人十人。”《晋书·高祖宣帝纪》载：“（嘉平）二年（250年）春正月，天子命帝（司马懿）立庙于洛阳……增官骑百人，鼓吹十四人。”一般说来，鼓吹人数就十余人到二十人左右，也有例外，成都博物院藏鼓吹画像砖上仅为六人（图2）。此砖拓本长48、宽40厘米，画面上两排六位鼓吹者分工明确，右最上一骑手持旌，为鼓吹队伍的指挥；在他身后一骑在击鼓，鼓为建鼓，上树羽葆；剩下四人为吹排箫、击铙者。

#### 四、“鼓吹”是皇帝赏赐功臣、属国和具有高贵身份者的仪仗

鼓吹也是皇帝奖赏功臣的一种荣誉，晋崔豹《古今注》道：“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赐有功诸侯。”《后汉书·班超传》曰：“（建初）八年（83年），拜超为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此时，虽然鼓吹早已配置与军队，但是其使用上尚有严格规定。班超因平定边地叛乱有功，提高规格奖赏鼓吹。但当时只有统领万人以上的大将才有资格配备和使用鼓吹和幢麾。班超其时刚官拜将兵长史，是以只能“假鼓吹幢麾”。当然，鼓吹还是皇亲国戚们所能拥有的特殊仪仗。同书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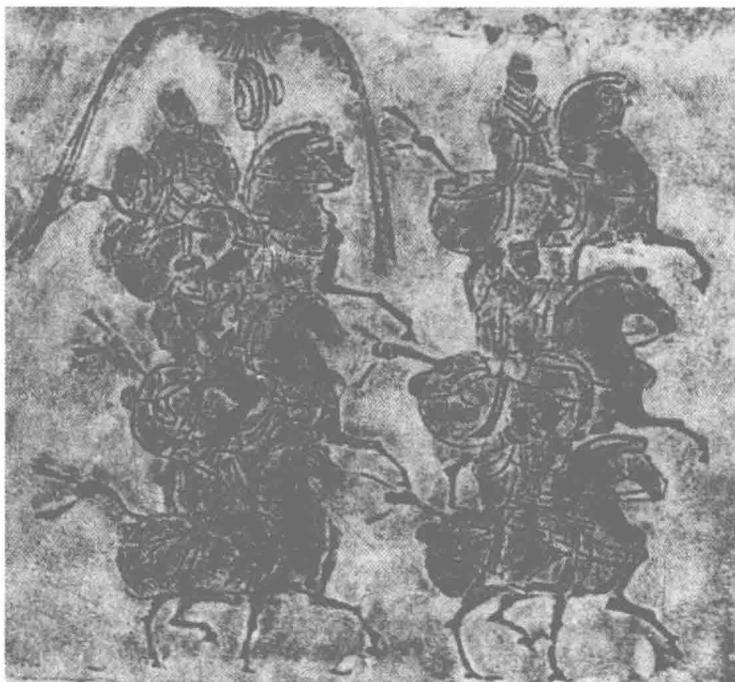


图2 成都市郊出土画像砖上的鼓吹

许美人为光武帝生的楚王刘英，被有司奏“大逆不道，请诛之”。光武帝因亲情关系不忍诛杀，只是废除其楚王名号，贬迁至丹阳，“遣大鸿胪持节护送，使伎人奴婢工技鼓吹悉从，得乘辎辂，持兵弩，行道射猎，极意自娱”。同书还记载了梁节王刘畅因受到举报感到惭愧，于是上疏汉和帝请求“所受虎贲、官骑及诸工技、鼓吹、仓头、奴婢、兵弩、厩马皆上还原署”，以取消自己的出行仪仗来得到宽恕。从上可知，班超能“假鼓吹”是朝廷格外奖励的军队仪仗。而楚王刘英和梁节王刘畅他们的鼓吹，则属于皇家子弟享受特殊待遇的。如前所引得知，鼓吹的创建初衷是“以财雄边”，是对边地民族加以震慑，在此作用下又逐渐变成中央王朝对边地属国的一种恩赐。《后汉书·高句骊传》载：“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同书《郡国志五》李贤注引王范《交广春秋》曰：“建安十五年治番禺县。诏书以州边远，使持节，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镇。”《三国志·魏书·鲜卑传》载，鲜卑部落首领扶罗韩被轲比能杀死，其子“归泥叛比能，将其部众降，拜归义王，（魏明帝）赐幢麾、曲盖、鼓吹，居并州如故”。

与鼓吹极为相似的是横吹，晋崔豹《古今注》云：“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河》、《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显然，横吹曲也是源自北方民族，是因张骞通西域而传入汉地。再经过李延年的改造、创新，于

东汉逐渐成为军中之乐。《乐府诗集》卷第二十一记载：“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箛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其实鼓吹和横吹还是有所区别的，首先是起源不同。鼓吹，前已说明源自汉班壹。其次二者还有使用的场合不同，组合的乐器不同等。但因横吹是北方民族尤其是草原民族自己拥有的，他们的乐器都是在马背上演奏，所以从汉代以来，这些北方民族器乐被引入中原后和黄门鼓吹一样都归于朝廷的鼓吹署，因此汉人将鼓吹和横吹常常混为一起，如《后汉书·班超传》载班超拜为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李贤注道：“横吹、麾幢皆大将所有，超非大将，故言假。”

鼓吹最初的使用是表示一种荣耀，是皇家子弟的特权阶层才能配备的仪仗，或是大将军之类有功于朝的高官方能获得的荣誉，到三国时期也是如此。蜀汉建兴三年（225年）春，诸葛亮率众南征大获全胜，朝廷因此“诏赐亮金铁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sup>[1]</sup>。《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载诏曰：“至于元戎出征，则军中宜有柱石之贤帅，輜重所在，又宜有镇守之重臣，然后车驾可以周行天下，无内外之虑……镇军随车驾，当董督众军，录行尚书事。皆假节鼓吹，给中军兵骑六百人。”这里配置的鼓吹，是作为军中特别的仪仗随行以壮军威。在《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中，孙权拜三十二岁的诸葛恪为抚越将军、丹阳太守，“拜毕，命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这时的鼓吹配置尚属于炫耀个人荣誉、彰显威风的仪仗。但是以后却因滥用，逐渐变得不那么尊贵了。“魏、晋世给鼓吹甚轻，牙门督将五校，悉有鼓吹”<sup>[2]</sup>，显然，这时鼓吹与等级、荣誉无关，仅仅是一种排场。

## 五、“鼓吹”是战场上鼓舞士气的军乐

按崔豹说法，“鼓吹之一章”是短箫铙歌。蔡邕在《礼乐志》中强调说：“汉乐四品：……其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sup>[3]</sup>前引《汉书·叙传上》中说是汉班壹创鼓吹，起因是“以财雄边”。这与蔡邕的说法是一致的，因为“雄边”必须具有足以震慑边地民族强大军事实力。所谓“建威扬德、风敌劝士”就是彰显己之威风、振奋己之精神，威慑对手，这正是鼓吹的军乐功能，是以将鼓吹配置于军队之中。真正将鼓吹运用于战场，发挥鼓舞士气功能是在三国时期。《三国志·吴书·甘宁传》载建安二十年，孙权率领甘宁等与张辽大战于合肥，“张辽觐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

宁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壮气毅然，权尤嘉之”。据裴松之注引的西晋虞傅所著《江表传》的描述，曹操出步骑兵40万与孙权7万人马在濡须大战，孙权“密敕（甘）宁，使夜入魏军……北军惊骇鼓噪，举火如星，宁已还入营，作鼓吹，称万岁”。将鼓吹运用得炉火纯青的还有孙权本人，《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胡冲《吴历》记载，曹操在濡须吃了孙权的亏之后，十分谨慎。当孙权再到濡须口向曹操挑战，后者坚守不出。孙权大胆地轻舟前往靠近侦察时，曹操以为有诈，“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孙权侦察完毕，得意洋洋地“回还作鼓吹”。曹操见到对方舟船配备整齐，兵器齐备，部队严阵以待，只好无奈地说：“生子当如孙仲谋。”

鼓吹既能鼓舞自己军队士气，亦能迷惑敌方。《三国志·魏书·张既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记载，正始二年（241年）东吴朱然围攻樊城，曹魏守将乙修等十分急切地向朝廷求救。夏侯儒领兵前往，屯驻邓寨后因兵少不敢前行，“但作鼓吹，设导从，去然六七里，翱翔而还，使修等遥见之，数数如是”。等到一月之后，司马懿率领援军到达，才共同进军赶走朱然。时有人认为夏侯儒胆怯，其实他是因兵少故意使用鼓吹、导从这样的大部队仪仗，在距离朱然六七里的地方反复招摇。既让乙修知道援军近在眼前，又让朱然感到对方有增援部队赶来而不能全力进攻樊城。鼓吹在此既鼓舞了自己军队的士气，同时也疑惑了对手。又《三国志·魏书·田豫传》载，田豫奉命清除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被轲比能的胡兵围在马城，他于是“使司马建旌旗，鸣鼓吹，将步骑从南门出，胡人皆属目往赴之。豫将精锐自北门出，鼓噪而起，两头俱发，出虏不意，虏众散乱，皆弃弓马步走，追讨二十余里，僵尸蔽地”。这是利用鼓吹迷惑对手的又一实际战例。

## 六、“鼓吹曲辞”具有教化功能

鼓吹作为激励将士振奋精神杀敌的军乐，光凭曲调显然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况且鼓吹所演奏的曲子未能流传下来，我们就很难想象汉魏时期的鼓吹是凭借什么而鼓舞将帅士气成为军乐的。宋郭茂倩在其所著的《乐府诗集》中为后人提供了可研究之线索。书中引《周礼·大司乐》记曰：“王师大猷，则令奏凯乐。”又引《周礼·大司马》记曰：“师有功，则凯乐献于社。”郑玄注道：“兵乐曰凯。”引《左传》曰：“振旅凯以入于晋。”所引《司马法》说得最明白：“得意则凯乐，凯歌以示喜也。”可知，但凡军队对外打仗荣获战功归来，都要奏凯乐以庆功，这是鼓舞士气和振奋将帅精神的最好表现形式，具体的形式就是鼓吹，在汉代被称为短箫饶

歌。鼓吹其实是一个统称，具体包括黄门鼓吹、短箫铙歌与横吹曲，只不过其用途不同而称呼不同。黄门鼓吹主要用于天子宴乐群臣；短箫铙歌使用之乐器简单，具有苍劲、悲壮之曲调故而成为军乐；而横吹（分马上吹奏和陆上行进吹奏两种形式）除使用吹奏乐器与鼓吹略有不同外，其使用场合与鼓吹同，故常被混称。那么鼓吹是用什么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的呢？

在汉代短箫铙歌又被称为“鼓吹铙歌”、“铙歌”，既被称为“歌”，当有歌辞，史书称之为“鼓吹曲辞”。那么这些歌辞都唱的什么内容？都有什么样的曲名呢？《晋书·乐志下》记载了汉时曲名：“汉时有《短箫铙歌》之乐，其曲有《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雍离》、《战城南》、《巫山高》、《上陵》、《将进酒》、《君马黄》、《芳树》、《有所思》、《雉子班》、《圣人出》、《上邪》、《临高台》、《远如期》、《石留》、《务成》、《玄云》、《黄爵行》、《钓竿》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战阵之事。”共二十二曲。在《宋书·乐志四》则记载有“汉鼓吹铙歌十八曲”，而其中个别曲名还有小的变化，如《雍离》变成《翁离》；《雉子班》变成《稚子》。《宋书》所载少了最后面的《务成》、《玄云》、《黄爵行》、《钓竿》四曲。为何少了四曲？郭茂倩解释是因这四曲“其辞亡”<sup>[4]</sup>，所以后代只记录汉鼓吹铙歌为十八曲。如果只是从文献记载的这些曲名来看，后人还是难以明白其中的内容。好在《乐府诗集》中不仅保存有全部曲名，还有完整的曲辞。从中我们得以窥见全部的内容。

汉代流传的鼓吹曲辞内容庞杂，明显不全是文人创作，应该是多种渠道来源。比如人们熟知的《战城南》开头就说：“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这是多么可怕的战争场景，将其在军乐中吹奏，由此激励将士们不惧牺牲，奋勇杀敌，来制止可怕的战争。但是《上邪》一曲，显然是采自歌颂男女爱情忠贞不渝的民歌曲，这就很难将其与振奋精神的军乐联系起来。

到了三国时期，传唱数百年的曲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原因是这一时期的战争较之以往更加残酷、激烈，统帅者迫切希望鼓吹在战场上真正发挥它鼓舞士气的作用。曹操直接命缪袭改写了其中十二曲的曲名和主题内容，比如汉曲的《上之回》原辞曰：“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sup>[5]</sup>虽然辞有显示大汉王朝强大的实力以使西域小国臣服之意，但全辞内容空泛，叙述轻飘无力，如何让人精神振奋？曹操让缪袭改《上之回》名为《克官渡》，其曲辞曰：“克绍官渡，由白马。僵尸流血，被原野。贼众如犬羊，王师尚寡。沙埽旁，风飞扬。转战不利，士卒伤。今日不胜，后何望。土山地道，不可当。卒胜大捷，震冀方。屠破城

邑，神武遂章。”显然修改后的曲名不仅主题明确，而且内容详实。全辞将袁曹官渡之战的过程作了详细的回顾，甚至包括战斗的细节和精神状态的描写。官渡之战本身就是曹操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战役，不仅以少胜多打败实力强大的袁绍，而且乘胜前进赢得了黄河中游势力范围的控制权，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因此曹操需要在军中进行传统荣誉教育，激励将士、振奋军威。我们发现，曹操命缪袭所改的十二曲，几乎是依次讲述了曹操的辉煌战功。改《朱鹭》为《楚之平》，说的是汉室衰微，社稷倾斜，曹操起义兵，要与群雄争夺天下。改《思悲翁》为《战荥阳》，说的是曹操参与讨伐董卓盟军，因盟军内部矛盾重重，他独自率军与董卓大将徐荣大战于荥阳汴水，虽然身上、战马都中箭伤，最后是换乘曹洪的马匹离开，但他是盟军中除孙坚之外唯一与董卓战斗过的指挥官。另十曲，据《晋书·乐志下》所载：“改《艾如张》为《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擒吕布也。改《上之回》为《克官渡》，言曹公与袁绍战，破之于官渡也。改《雍离》为《旧邦》，言曹公胜袁绍于官渡，还谯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战城南》为《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邳，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为《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历白檀，破三郡乌桓于柳城也。改《上陵》为《平南荆》，言曹公平荆州也。改《将进酒》为《平关中》，言曹公征马超，定关中也。改《有所思》为《应帝期》，言文帝以圣德受命，应运期也。改《芳树》为《邕熙》，言魏氏临其国，君臣邕穆，庶绩咸熙也。改《上邪》为《太和》，言明帝继体承统，太和改元，德泽流布也。其余并同旧名。”同样，东吴政权也效法曹操，“使韦昭制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其修改曲辞数量相同为十二曲，内容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讲述本集团的战斗历程和创建的功德；二是大讲自己建立政权是符合天命的。前者如《上之回》改为《乌林》，内容讲述曹操大军南下收服荆州、将渡江横扫江东之时，孙权令周瑜带兵出击，在乌林痛击曹军、大获全胜的赤壁之战；将《巫山高》改为《关背德》，说的是蜀将关羽背弃吴蜀联盟，东吴军队在孙权带领下渡江打败关羽的战役。后者如《思悲翁》改为《汉之季》，讲述孙坚哀叹汉室衰微，痛斥董卓之乱，于是兴兵奋击，功盖海内。又接连将《将进酒》改为《章洪德》、《有所思》改为《顺历数》、《芳树》改为《承天命》，目的都是为东吴建立找到道义和天时的充分理由。<sup>[6]</sup>

与曹操和孙权两个权力集团相比，蜀汉政权则承继汉室传统更彻底些。不仅在鼓吹赏赐和使用上显得慎重，也不在曲辞的内容中做任何修改，也许这是为向世人表明蜀汉才是汉家天下的真正继承者吧。

从曹、孙他们修改的曲辞内容来看，不外是鼓吹本集团光荣的战功和代汉立国实为顺应天意和民众愿望。在我们至今尚未了解到更多的内容之前，利用鼓吹曲辞